

“中国农村研究”与“东亚农村研究”

张玉林

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教授）



2010年盛夏，京都大学的几位年轻学人在平田昌司教授的带领下，来到南京实施作为“中国研究短期集中项目”的中国农村调查。出于对京大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一种有意识转向——从只注重传统的“汉学”到关注巨变中的中国？——的感佩，我和南大的几位学子也积极地参与了这项活动。并向他们推荐了两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村庄：工业化程度较高、涌入大量外来人口的吴江市开弦弓村，以及位于大都市远郊、人口外出-外迁较多的南京市江宁区青龙村。

京大同仁们的兴趣在于“探索中国农村研究的方式”，通过实地调查来研究“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”，查明“农村居民会以何种形式何种理由，在农村内部以及与外界进行结合”。现在，他们提出了初步的调查研究报告，嘱我写一些感想。我的确是“感慨无量”，但因篇幅上的限制，这里仅略述两点，以尽续貂之责。

第一，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，京大同仁们的关注点应该说对于中国的同行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。在一个人心的流动和人身的流动都异常剧烈的时代，当村庄从极端封闭走向高度“开放”和“外泄”，从“熟人社会”逐步变成“陌生人的社会”，探讨社会“结合”的因缘、形式和可能性，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重新担负起社会学的原初使命，还是从实践的角度（在陌生人的社会重建“信任”及“和谐”）尽力于社会学者的应有职责，这都是一个重大命题，不仅难以回避，而且理应首选。

第二，同样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，“中国农村研究”似乎已经很难再孤立地存续，或者即便能够存续也很难有所突破。就浅见而言，“中国农村”虽然因制度、文化的影响而呈现一定的独特性，但其实与日本、韩国，以及台湾地区的农村有着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。概而言之，尽管各个政治体都曾经和正在实施不同形式的“农村建设”计划，但东亚农村的衰落、凋敝、分崩离析的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，而且仍在加速。“过疏化”（空洞化）、“界限集落”、“留守儿童”、“独居老人”，乃至“新娘不足”等现象，都昭示了“东亚小农圈”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痛楚。而在东亚农村走向解体和崩溃的背后，蕴藏着一个异常明显但并没有受到整体性重视的巨大尴尬：从食物供应或“谷物自给”的角度而言，东亚农村已经无法养活东亚的人民。这实际上可以看作一种文明——“东亚资本主义”以及“中国式的资本主义”——的危机。这种危机不仅是所谓“东亚的奇迹”的巨大代价，也是对它的巨大嘲弄。

如何面对“中国农村”的独特性和“东亚农村”的共同性？我很认同报告执笔者中山大将先生的主张：“农村研究者所关注的（事象）不应被地域的边界所分隔”。为了避免只见树木、不见森林的危险，有必要在比较研究和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展开整合研究——“东亚农村研究”——。这需要东亚的同行一道来进行集体性的反思、自觉和努力。

农历2010年岁末于南京